

哪些创业失败者更可能卷土重来?^①

——基于松-紧文化与制度环境的跨国比较研究

杨学儒¹, 叶文平^{2*}, 于晓宇³, 李新春⁴, 苏晓华²

(1.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州 510642; 2.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3.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4.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 高失败率是创业热潮中创业者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创业失败在为创业者带来大量情绪与财务成本的同时,也提供了独特的学习经验。如何激活创业失败者卷土重来的激情是降低创业社会成本的关键。文章整合组织学习和创业认知理论构建了统一的创业失败学习理论逻辑。结合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世界银行和松-紧文化3个跨国数据库,考察了不同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下不同性别个体的创业失败经历对其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没有失败经历的个体相比,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更可能选择创业;高宽松度的国家文化、好的制度环境分别强化了这一关系;性别与文化宽松度对这一关系有显著的三重调节效应。即在高宽松度的国家文化下,有创业失败经历的女性创业者再次创业的概率更高。将性别角色差异纳入到创业失败的分析框架中,同时也扩展了创业失败的文化与制度分析。

关键词: 创业失败; 文化宽松度; 制度环境; 女性创业; 创业决策

中图分类号: F273.1; F276.3; F2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19)11-0001-18

0 引言

创业活动是高度不确定情境下的冒险,其失败率高是创业热潮中创业者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那么,创业失败者会否卷土重来,有何情境条件?回答好这一问题,对于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培育失败者再次创业的适宜环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甚至提升创业成功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理论上,创业失败经历对个体行动者创业决策有何影响?现有文献总体上可区分为组织学习和创业认知两种理论视角,两种视角关于创业失败经历与个体行动者创业选择关系的理论推断完全相反。组织学习理论关注“试错”学习的正面价值,认为个体行动者在创业失败的试错过程中学习和积累的独特经验能够提高其发现和识别创业

机会的能力^[1]。而创业认知理论聚焦于创业失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情绪成本),指出,创业失败带来的挫败感会降低个人自我效能感和风险承担倾向,从而降低其创业意愿^[2]。这些研究显著增加了关于创业失败影响个体行动者创业决策的不同层面的知识,但两种理论视角都面临着与其不一致的经验证据的挑战。这一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研究的两个理论视角分别截取了个体行动者创业决策的不同的重要片段,没能“真正”构建起解读创业失败经历如何影响个体行动者创业决策的统一理论框架;同时,现有研究对个体行动者所处的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等重要情境条件的差异性影响重视不足,不能系统阐明其理论逻辑适用的情境条件。实际上,个体行动者的创业选择是个体特征与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相结合

① 收稿日期: 2018-03-29; 修订日期: 2019-01-3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资助项目(718101070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673090; 71902072).

通讯作者: 叶文平(1989-),男,湖北黄冈人,博士,讲师. Email: yzq721@yeah.net

的产物^[3-5],是对自身特质、能力、资源和环境等要素的综合权衡,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塑造的价值观与准则不仅会影响创业失败的情绪与财务成本^[6],同时也会影响创业失败学习的过程,进而决定了个体行动者的创业决策。因此,创业失败学习应视为是个动态化的过程,在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下,它能够改变个体行动者的元认知和既有思维模式,进而影响创业选择。基于此,本文整合了组织学习和创业认知理论,构建了统一的创业失败学习理论逻辑,并将其放在不同国家环境下考察,检验了创业失败经历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了国家文化与制度因素在不同性别个体上的差异。通过匹配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世界银行和 Gelfand 等^[7]数据库,建立了全球 23 个国家 2001 年~2009 年 306 020 个观测数据,实证检验支持了本文整合提出的创业失败学习的理论逻辑。

本文可带来几方面的理论意义:1) 通过整合组织学习和创业认知理论,挖掘创业失败经历影响创业决策的制度和情境条件,构建了动态化视角的创业学习理论,并明确了该理论的边界和内涵,从而回应了关于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决策的现有研究的不一致现象^[1-2]。2) 扩展了创业失败的文化与制度分析,将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决策的关系置于不同的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背景下考察,从而清晰地呈现文化和制度情境与创业失败经历的共同作用。比如,先前创业失败经历带来的财务成本和情绪成本会严重影响个人行为决策,而不同的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与创业失败的两类成本存在密切的关系^[8]。这为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差异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3) 进一步明晰了文化影响创业决策的性别差异,通过三重调节效应区分了男性和女性在不同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下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决策之间关系的差异。与不同的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相结合,发现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差异直接决定了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成本的差异,进而影响其创业决策。本文采用三重交互调节效应检验了性别差异的影响,不仅扩展了已有理论的应用边界,同时也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4) 通过匹配 GEM、世界银行和

Gelfand 等数据库构建了 30 余万个随机抽样的有效微观样本面板数据,克服了现有研究存在的样本自选择偏差(如调查对象都是创业者)、单一区域或国家(文化或制度环境的特殊性难以识别)等统计检验缺陷,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经验证据。

本文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决策在不同文化、制度及性别情境下的差异效应,这意味着适当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培育宽松的文化环境,性别更平等的社会环境,可以对鼓励创业者走出创业失败的阴影,开展成功的再次创业有重要影响,从而为如何营造更友好的创业环境提供了参考着力点。

1 理论与假设

1.1 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决策

创业失败经历如何影响个体行动者的创业决策? 聚焦于个体行动者创业决策的知识结构形成和演化规律的创业认知学派^[9-11]揭示了创业失败如何影响了个体行动者的创业认知,进而如何影响其再次创业意愿和能力。具体地,在创业认知学派的逻辑框架下,个体行动者创业决策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与环境的影响^[4],而创业失败这一特殊情景对于形成个体行动者的创业认知存在密切联系^[12]。创业失败是创业者在未达成其目标条件下终止或退出新创企业经营活动^[13],已有研究表明创业失败会从财务成本和情绪成本两方面给创业者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例如:个人财产损失,信用水平下降,损害社会关系网络,创业失败的污名带来的心理负面情绪会严重降低个人自我效能感^[3,13-15]。这些负面结果不仅会降低个体行动者面临再次创业决策时的信心和风险承担,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其创业活动过程中资源获取和动员的能力^[6]。但创业失败经历的影响并非总是消极的,相比于对社会声誉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来降低个人创业选择意愿,失败经历所激发的个人心智模式改变和挑战性反思能够提高个体行动者未来的创业选择意愿^[12]。

实际上,创业失败的经历一方面影响个体行动者创业认知,另一方面也成为影响其创业学习

的关键事件。创业学习作为创业活动相关经验知识积累与创造的过程,也是个体行动者利用知识进行最优决策的过程^[16,17]。虽然外部环境动态性、组织资源的丰腴以及个人创业警觉性都是激发创业学习的重要诱因,但其实创业过程中的间断经历(discontinuous experiences)对引发独特的高水平学习模式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18],而创业失败正是激发起高效学习模式的重要间断经历。高效的创业者都是杰出的学习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创业失败经历作为独特的学习情境,对于个体行动者的创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创业失败学习作为意义构建的过程,形成了个体元认知、比较思维和复杂思维等较高层次思维方式的相互作用^[19],这些思维方式的构成恰恰是形成个体创业认知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分析认为,以创业失败经历引致的动态学习过程为基础,可以整合创业认知学派与组织学习理论,形成统一的创业失败学习理论逻辑,可以全面、一致、情境化地阐明创业失败经历对创业决策的影响。

对个体行动者而言,创业失败经历所激发的学习过程能够极大地影响其心智模式与创业思维的改变,从而影响其创业决策。创业失败经历能够影响个体行动者的创新性思维,改变个人创业警觉性和提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认知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个体思维模式主要取决于元认知对市场信息的处理与搜集而做出决策与判断形成的反馈。当判断正确形成积极的反馈时,元认知就会强化这一思维模式,形成惯例的决策方式;而当判断形成消极的反馈时,元认知就会弱化这一思维模式,改变这一决策方式^[20]。正如 Haynie 等^[21]认知适应性研究所指出的一样,对于缺乏创业经验的创业者来说,个人元认知形成的思维类比推理是决定创业决策的关键。当个体行动者遵循已有元认知基础上的思维模式展开的创业活动失败后,失败经历一方面会形成负反馈导致个体行动者改变已有的思维模式,摒弃先前认知模式中存在的缺陷,从而形成新的思维方式^[22],全新的思维方式能够让个体行动者摆脱对固有知识的依赖^[23,24],形成与外部环境更为匹配的创业认知,保持更高的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机会的敏锐性,进行再次创业^[25]。另一方面,创业失败经历会促使

个体行动者改变信息搜集和处理方式,通过对比判断先前信息偏误来锁定更有效的信息处理方式,从而扩展个人获得信息的宽度和深度^[26]。对于个体行动者而言,广泛而有效的信息来源是识别创业机会的关键,创业机会的发现观和创造观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致性的共识^[27,28]。个体行动者对于通过稀缺市场信息所识别的创业机会将保持更高的创业积极性和执行力^[29],从而增强了个体行动者未来的创业意愿。

创业失败的经历不仅会改变个体行动者的思维模式,优化信息搜集和处理方式,也有利于培养个人的创业激情和克服过度自信。创业效能感(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被视为个体对于自身调动所需的资源和技能来完成特定的创业活动的信心,创业认知学派的观点一致认为个体创业效能感的程度是决定其创业选择的关键^[30]。已有的研究均认为创业者的失败经历会降低创业效能感,对创业者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双重伤害,降低了创业者的激情,导致其丧失卷土重来的勇气^[31]。但最新的研究发现,创业失败经历并不会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效能感,反而会增加创业者的信心^[6,32]。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个人创业效能感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对事物的认知和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当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与自我能力的评估更为全面的时候,个人对自我能力与任务难度清晰的匹配程度的了解更有利于个体行动者建立创业效能感^[33]。对于个体行动者而言,创业失败经历作为刺激创业者进行自我学习、自我反省的外部因素,能够促使创业者对创业活动任务难度与个人能力有更全面的了解,有利于修正“未失败偏见”(pre-failure bias)带来对创业机会的不现实预期^[34],帮助个体行动者形成更高的创业效能感,提高其创业激情与自信心,在后续过程中创业意愿更高。正如 Cardon 等^[6]所提出的那样,经历了严重失败的创业者在创业机会面前不会退缩。换言之,与没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相比,受挫的创业者具有更多的自信和创业激情,因为他们将失败看成是创业成功的入场券。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相比于没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行动者而言,有失败经历的个体选择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高。

1.2 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创业失败这一关键间断经历影响了个体行动者的创业认知,激发了其创业学习,而且这一动态过程受到个体行动者嵌入的社会网络或组织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与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厘清国家文化和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有利于明确创业学习理论逻辑的边界和适用条件。国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是一个国家内的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35],外部制度环境则是构成商业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对于经历创业失败的个体行动者而言,外部环境中国家文化的包容性和制度环境的完备性都是降低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财务成本和情绪成本、改善创业学习过程的重要情境性因素。

现有关于国家文化与创业活动的研究大多依赖于 Hofstede^[36]的4个文化维度模型,但较多争议者指出,这一模型一方面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其文化维度的定义相对模糊^[37]。近年来,国家文化松紧度(tight and loose cultures)的概念越来越为跨国比较研究所重视^[38,39],为跨国比较的创业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国家文化松紧度作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新维度,它发轫于人类学的文化田野考察,致力于刻画不同文化间社会规范强度和对偏差行为宽容程度的结构性特征。松-紧文化中的“紧”指规范强,对偏差行为包容度低(惩罚强);而“松”是指规范弱,对偏差行为包容度高(惩罚弱)^[7]。松-紧文化包括两个关键要素:第一是规范的强度,或者说规范的清晰度与普遍性;第二是惩罚程度,或者说是对偏离规范行为的宽容度^[40]。因此,松-紧文化反映了特定国家对偏差行为的惩罚强度与规范强度的社会文化。显然,松-紧文化是非常适宜于创业活动的跨国比较研究的理论概念,因为创业活动天然具有“合法性困境”,其行为多表现为非“中规中矩”,而呈现出差异化、创新,甚至颠覆既有商业模式等特征。具体到创业失败与再次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松-紧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松-紧文化会影响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的财务与情绪成本,进而影响其再创业意愿。相比于松文化而言,紧文化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更强调对风险的抵御和规避^[41],表现出强烈的规范,对偏差行为容忍水平低,并伴随着强有力的惩

罚^[39]。在紧文化国家,对于经历创业失败的个体行动者而言,其不仅遭遇财务损失,家庭成员和社会组织对其失败的较低容忍度还提高了其创业失败的情绪成本,放大了其对客观的财务损失的主观感受,社会群体的认知对失败创业者更强烈的“污名”态度直接损害了个体行动者再创业勇气、信心和激情^[42]。简言之,紧文化国家情境下的创业失败者感知到更强的财务损失、情绪成本和社会支持损失,从而降低了其再次创业的可能性。同时,紧文化形成的风险规避会提高其后续展开创业活动的资源动员成本,阻碍其新的创业活动的开展。

另一方面,松-紧文化还会影响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学习的过程,进而影响其再创业意愿。创业失败学习作为自我启动和激励的个体行为受到价值观的影响,而其价值观塑造与不同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43]。个体对创业活动失败的归因是激发其创业失败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当个体行动者将创业失败归因为外部因素时并不能有效激发其自我认知和学习的动机,而当其将创业失败归因为内部因素时更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创业过程中的不足与失误,表现出更强烈的学习动机^[44,44]。而紧文化所形成的强外部情景的限制会导致个体行动者更容易将创业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45,46],从而降低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学习的动机,降低了其通过创业失败学习来改变其思维方式和创业警觉性,导致再次创业意愿降低。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 国家紧文化程度越高,相比于没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行动者而言,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选择创业活动的可能性会被削弱。

制度作为社会的博弈规则,不仅会约束个体行为,同时也会影响其期望^[47,48]。对于具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行动者而言,完备的制度环境会降低创业失败的财务成本,降低后续创业意愿的资源约束。在制度环境相对不完备的国家,个体行动者创业资源的获取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关系网络或非正规的融资渠道。当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后,通过个人关系网络获取的资源会严重地损耗个人社会声誉和社会资本,通过非正规融资渠道获得的外部资源则面临更高的债务成本,创业失败的高成本会降低个体行动者再创业的风险承

担, 同时也会严重地阻碍其后续创业资源的获取能力。而在制度环境相对完备的国家, 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个人信用体系不仅能够降低创业失败的成本和后续资源获取的约束, 规范的企业破产法律会对个体行动者形成保护屏障, 降低个人财产风险。

与此同时, 完备的制度环境还有利于经历创业失败学习个体行动者发现更多的创业机会。创业活动社会化过程的重要体现就是机会识别与资源动员都与外部环境存在紧密的互动, 环境因素所体现出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是环境承载者所提供功能的外在表现^[49, 50]。创业认知学派的代表人物 Baron^[51]就指出, 创业者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对创业者认知能力会产生极大影响, 完善的制度环境是个体行动者识别创业机会的触发器。虽然早期对于转型经济的创业研究认为制度环境的不完备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16]。但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对于这类由于正式制度缺失导致的创业机会往往存在稀缺性和排他性, 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创业者才可能获取^[52]。相比之下, 较完备的制度环境通过形成良性市场竞争、创造利基市场和资源支持能够提供更多创业机会, 而这一类创业机会更有利那些经历过创业失败的“创业熟手”^[53-55]。由此, 提出以下假设。

H3 国家制度环境越完备, 相比于没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行动者而言, 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会被强化。

1.3 三重调节效应

个体行动者的创业决策不仅受到个人认知与外部环境的影响, 同时与个体行动者的性别存在密切联系。Fischer 等^[56]的研究指出, 创业者的性别不仅决定了其行为所面临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评判, 同时也决定了其创业资源的获取。相比于男性而言, 传统社会价值观形成的男、女社会角色定位与分工决定了女性创业者创业活动会面临更大的约束。一方面, 女性社会角色定位主要以家庭为主, 创业活动具有不确定性或较高的风险, 会增加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 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 这使寻求创业机会的女性创业者不易得到家庭的支持^[57]。另一方面, 创业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创业活动常常会加剧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

与男性创业者相比, 社会文化价值观虽然会导致女性创业者面临更多的创业约束, 但同样也

降低了社会群体对女性创业者创业绩效的社会期望^[58], 当女性创业者面临失败时, 社会群体更多会将其失败归因于其社会角色冲突、性别歧视等外部原因, 表现出更大的包容度。而在紧文化国家, 社会群体对创业失败者的包容程度能够直接决定其创业失败成本, 进而影响其再次创业意愿。

紧文化国家所强调的较低的社会偏差容忍度和较高的风险规避, 意味着紧文化国家更重视社会价值观所形成的社会角色分工, 维护男性社会地位与权威^[59], 但同时也意味着对男性创业活动存在更高的社会期望。相比于女性而言, 男性创业活动失败的成本更高。Gelfand 等^[7]对 33 个国家的调查发现, 紧文化国家更强调对个人行为的严格约束, 对于失败的容忍度较低。在社会文化规范强烈, 对偏差行为容忍水平较低, 而惩罚有力的紧文化国家情境中, 其社会刻板印象对男性创业成功的社会期望更高, 男性创业者失败所带来的污名会直接导致其背负更高的财务与情绪成本; 相比之下, 紧文化下女性角色的弱势定位带来对其创业失败更多包容, 这有助于改善其创业学习, 再次创业的可能性更高。与此同时, 在紧文化严格强调社会角色分工情境下, 女性创业者通过创业来突破社会角色束缚, 即使创业失败也能得到更多认同者的支持, 为其再次创业提供了潜在的社会资源支持。由此, 提出以下假设。

H4 国家的紧文化程度越高, 相比于男性创业者而言, 有创业失败经历的女性创业者更可能选择创业。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包括 GEM 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和 Gelfand 等^[7]松-紧文化测量数据库, 本文对其进行了匹配。个体层面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GEM2001 年~2009 年全球个体样本的调查数据。GEM 创建于 1997 年, 由英国伦敦商学院和美国百森学院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创业研究项目。自 1999 年首次发布报告, 到 2017 年, 已经连续进行了 18 年的调查, 名称也从最初的世界创业指数

(World Enterprise Index) 更名为全球创业观察。如今, GEM 组织的研究已经累计涵盖全球 100 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样本代表了全球约 3/4 的人口和全球近 90% 的 GDP。GEM 调查数据由于其科学性、专业性和严谨性成为创业研究领域中最权威的创业调查数据^[60]。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GEM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为基础的持续跟踪调查, 因此各年份的调查对象中从潜在创业者、创业失败者、创业失败再创业者、创业成功连续创业者、首次创业者等与本研究问题紧密相关的研究对象的分布符合随机样本的统计要求, 有效地避免了样本自选择等其它创业调查常常面临的统计偏差。同时, 其样本数据涵盖全球各类国家文化和制度环境, 因此, GEM 数据库非常适宜作为研究类似问题的基础数据库。

国家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松 - 紧文化的数据来源于 Gelfand 等^[7] 的松 - 紧文化测量数据库。为满足研究需求, 本文对三者进行了匹配, 最终构建起 2001 年 ~ 2009 年包括美国、中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巴西等 23 个国家共 306 020 个随机抽样的有效样本。其中, 美国样本占比 4.69%, 中国样本占比 2.15%。

2.2 模型构建

基于本文的假设, 借鉴以往关于创业选择的 Probit 模型, 首先为了检验假设 1 构建了检验模型(1)

$$EC = \beta_0 + \beta_1 EF + \sum_i (\alpha_i \times Control_i + \varepsilon_{ii}) \quad (1)$$

为了检验假设 2 ~ 假设 5 构建了以下模型

$$EC = \beta_0 + \beta_1 EF + \beta_2 EF \times CT + \sum_i (\alpha_i \times Control_i + \varepsilon_{ii}) \quad (2)$$

$$EC = \beta_0 + \beta_1 EF + \beta_2 EF \times IN + \sum_i (\alpha_i \times Control_i + \varepsilon_{ii}) \quad (3)$$

$$EC = \beta_0 + \beta_1 EF + \beta_2 EF \times CT + \beta_3 EF \times GEN + \beta_4 CT \times GEN + \beta_5 EF \times CT \times GEN + \sum_i (\alpha_i \times Control_i + \varepsilon_{ii}) \quad (4)$$

$$EC = \beta_0 + \beta_1 EF + \beta_2 EF \times IN + \beta_3 EF \times GEN + \beta_4 IN \times GEN +$$

$$\beta_5 EF \times IN \times GEN + \sum_i (\alpha_i \times Control_i + \varepsilon_{ii}) \quad (5)$$

式中 EC 表示个体是否选择创业; EF 表示个体先前是否有创业失败经历; CT 表示个体所在国家文化的松 - 紧程度; IN 表示个体所在国家的制度环境; $Control$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国家层面的人口规模、失业率、人均收入, 个体层面的年龄、工作经验、教育程度和实际收入; ε_{ii} 是残差项。

2.3 变量测量与定义

2.3.1 因变量

创业选择。GEM 调查将初期创业者定义为创业启动已经持续 12 个月并且个人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61]。本研究中个体创业选择数据来源于 GEM 调查数据, 定义与其保持一致, 即依据受访者在接受调查访谈时对前述是否创业问题的回答。若被调查者符合该条件则赋值为 1, 不符合条件赋值为 0。

2.3.2 自变量

创业失败经历。创业失败经历主要借鉴 McGrath^[13] 和 Davidsson^[62] 的定义“创业失败作为创业者未达成其目标条件下对新创企业的终止或退出新创企业经营活动”。GEM 问卷调查题为“在过去的 12 个月或更久时间内您是否关闭或终止您自己企业的经营?”, 调查者回答“是”赋值为 1, “否”赋值为 0。

2.3.3 调节变量

松 - 紧文化。Gelfand 等^[7] 采用主体间视角开发了松 - 紧文化的测量量表, 该量表主要包括 6 个测量维度, 即在这个国家: 1) 有很多需要人们遵循的社会规范; 2) 大部分情境下对人们如何行事有明确的期望; 3) 人们一致同意大部分情境下怎样的行为是合适或不合适的; 4) 人们在大部分情境下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如何行动(反向计分); 5)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不适宜, 其他人会强烈地反对; 6) 人们几乎总是符合社会规范的。他们根据这一量表测量了 33 个国家或地区的松 - 紧文化指数, 本文也采用这一指数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文化松 - 紧程度^[7]。

制度环境。世界银行关于全球治理指标的研究报告中, 收录了对全球 213 个国家或地区 1996 年 ~ 2009 年的跟踪调查报告, 该报告主要包括:

政治稳定、话语权和责任、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制和腐败控制。借鉴王永钦等^[63]的研究，根据制度环境的 3 个维度规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采用政治稳定、话语权、责任、政府效率、法制和腐败控制以及监管治理性 6 个指标加总求均值来测量制度环境。

性别。根据被调查者个人性别进行编码，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

2.3.4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国家层面分别控制了以下变

量：1) 人口规模。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各国人口数据取对数处理；2) 失业率。考虑到失业率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个体被迫选择创业；3) 人均收入。创业启动资金是约束个体创业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在本研究中采用的世界银行统计的各国人均年收入购买指数 CNI，将数据结果取对数。个体层面则控制了以下变量：1) 个人年龄；2) 教育程度；3) 工作经验；4) 实际收入。以上所有变量的测量指标见表 1。

表 1 变量说明

Table 1 Variables description

类型	名称	代码	测量指标与编码
因变量	创业选择	EC	GEM 题项“您现在拥有的新创企业是否持续经营 12 个月以上”，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
自变量	创业失败经历	EF	GEM 题项“在过去的 12 个月或更久时间内您是否关闭或终止您自己企业的经营？”，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
调节变量	松 - 紧文化	CT	采用 Gelfand 等 ^[7] 对不同国家松 - 紧文化的测量指数
	制度环境	IN	借鉴王永钦等 ^[63] ，将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6 个分指标进行加总求均值来测量
	性别	GEN	GEM 被调查者性别，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
控制变量	人口规模	POP	世界银行数据库各国人口数据取对数处理
	失业率	UNE	世界银行数据库各国失业率数据
	人均收入	CNI	世界银行数据库各国人均年收入购买指数 CNI 取对数处理
	年龄	AGE	GEM 被调查者年龄
	工作经验	EXP	GEM 题项“您之前是否有过工作经历？”，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
	教育程度	EDU	GEM 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赋值：未接受教育赋值 0、小学赋值 1、初中赋值 2、高中赋值 3、大学本科及以上赋值 4
	实际收入	INC	GEM 题项“你觉得个人收入属于社会哪一层级？最高 33% 赋值 3，中间 33% 赋值 2，底下 33% 赋值 1

2.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对主要变量做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共线性检测。描述性统计发现，全样本中选择创业的个体比例为 7.87%，没有选择创业的样本占 92.13%，创业和非创业者样本比例结构合乎现实，表明该数据库的抽样程序确实是随机抽样，总样本具有良好的“无偏”特性，基于该样本的实证检验可以避免大多数创业研究面临的样本选择偏差局限。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方面，样本中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比例为 3.52%；文化松 - 紧程度的均值为 6.19，标准误为 1.66，制度环境的均值为 1.53，标准误为 0.61。

相关性分析表明，个体行动者先前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选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紧文化

与创业选择存在显著负相关，制度环境与创业选择存在显著正相关，初步结果与判断逻辑一致。另一方面，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基本上都小于 0.3，结合共线性检测，可以认为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适宜用作后续假设检验。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思路如下：首先检验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其次检验文化松 - 紧程度和制度环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后检验性别的三重调节效应。借鉴已有的做

法^[64] ,使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几个变量的主效应、双重交互效应和三重交互效应进行逐步的检测.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采取了 Aiken 等^[65] 的建议,在生成交互项时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中心化.

表 2 汇报了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经历、松 - 紧文化与再创业选择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模型

M1 为基准模型,包含所有的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 模型 M2 为主效应模型,包含了自变量、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模型 M3、模型 M4 为调节效应模型,模型 M5 为全模型. 模型 M2 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经历与再创业选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eta = 0.199$ $p < 0.01$),

表 2 创业失败经历、松 - 紧文化与创业选择关系检验

Table 2 Regression of prior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tight-loose culture and the choice of entrepreneurship

变量	EC				
	M1	M2	M3	M4	M5
POP	0.014 2*** (0.003 13)	0.013 5*** (0.003 13)	0.013 6*** (0.003 12)	0.017 1*** (0.003 15)	0.017 2*** (0.003 15)
UNE	-0.010 2*** (0.001 23)	-0.009 68*** (0.001 23)	-0.009 61*** (0.001 23)	-0.011 2*** (0.001 24)	-0.011 1*** (0.001 24)
IN	0.110*** (0.014 1)	0.110*** (0.014 1)	0.113*** (0.014 1)	0.118*** (0.014 2)	0.118*** (0.014 2)
CT	0.004 46** (0.002 17)	0.003 69* (0.002 17)	0.004 75** (0.002 18)	-0.015 1*** (0.003 37)	-0.015 5*** (0.003 38)
CNI	-0.293*** (0.013 9)	-0.286*** (0.013 9)	-0.291*** (0.014 0)	-0.281*** (0.014 1)	-0.282*** (0.014 1)
AGE	0.009 37*** (0.000 259)	0.009 37*** (0.000 259)	0.009 38*** (0.000 259)	0.009 22*** (0.000 260)	0.009 21*** (0.000 260)
EXP	-0.259*** (0.007 36)	-0.259*** (0.007 37)	-0.258*** (0.007 37)	-0.243*** (0.007 42)	-0.243*** (0.007 42)
INC	0.234*** (0.004 45)	0.233*** (0.004 45)	0.234*** (0.004 45)	0.219*** (0.004 49)	0.219*** (0.004 49)
EDU	-0.006 53** (0.003 24)	-0.006 95** (0.003 24)	-0.006 94** (0.003 24)	-0.008 65*** (0.003 26)	-0.008 65*** (0.003 26)
EF		0.199*** (0.017 1)	0.458*** (0.058 0)	0.486*** (0.061 3)	0.228** (0.107)
EF × CT			-0.038 8*** (0.008 38)	-0.044 4*** (0.008 43)	-0.004 00 (0.015 9)
GEN				0.293*** (0.006 96)	0.294*** (0.006 97)
GEN × EF				-0.033 3 (0.036 6)	0.329*** (0.127)
GEN × CT				0.026 7*** (0.004 09)	0.027 8*** (0.004 11)
EF × CT × GEN					-0.055 9*** (0.018 7)
χ^2	8 394.40***	8 525.78***	8 547.32***	10 388.74***	10 397.63***
伪 R^2	0.048 5	0.049 2	0.049 4	0.060 0	0.060 0
观测数	306 020	306 020	306 020	305 953	305 953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且在全模型 M5 中保持较好的稳健性, H1 得到验证。这表明, 创业失败经历不仅会激发个体创业失败学习, 改变创业者认知模式, 同时也会提高个体行动者创业警觉性, 有利于个体行动者识别潜在的创业机会。

表 2 中模型 M3 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 个体行动者所在国家的紧文化程度越高会削弱个体行动者先前创业失败经历与再创业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beta = -0.0388$, $p < 0.01$), H2 得到支持。个体行动者所在国家紧文化程度越高, 社会普遍价值观对创业活动失败行为的容忍程度较低, 会提高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的财务成本与情绪成本, 会降低个人自我效能感和再创业可能性。

表 2 中模型 M4 和 M5 检验了个体行动者性别的三重调节效应。借鉴 Dawson 和 Richter^[64] 关于三重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 依次将自变量、两个调节变量、以及自变量和两个调节变量两两相乘的交互项先放入回归方程 (M5), 然后再将三者的交互项加入 (M4), 查看其显著性。回归结果表明, 在紧文化国家, 相比于女性创业者, 男性先前创业失败经历与再创业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削弱 ($\beta = -0.0559$, $p < 0.01$), H4 成立。

表 3 汇报了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经历、制度环境与再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检验。模型 M3 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 个体行动者所在国家的制度环境越完备会强化个体行动者先前创业失败经历与再创业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beta = 0.200$, $p < 0.01$), H3 得到支持。个体行动者所在国家制度环境越完备, 不仅会降低创业失败风险和成本, 同时也有利于具有失败经验的创业者识别潜在的创业机会, 促进其创业活动。模型 M4 和 M5 报告了制度环境与创业者性别的三重调节效应, 结果显示此三重调节效应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理解上述调节效应, 使用 Aiken 等^[65] 的方法进行了简单斜率检测 (simple slope test) 和两维交互图的绘制。结果表明, 上述调节

效应假设 2 ~ 假设 4 成立。

3.2 稳健性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具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行动者会更倾向于参与创业活动, 但主要是将所有具有失败经历的个体行动者与不具有失败经历的创业者进行对比, 这一对比方法可能会存在样本的配对偏差。一种可能是具有创业失败经历的创业者可能天生具有更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或资源优势。为了避免样本配对存在的偏差, 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的方法来分析创业失败经历对创业意愿可能产生的影响^[66]。

在进行样本选择性匹配之前, 首先对具有创业失败经历和不具有创业失败经历的样本进行简单的单因素对比检验, 对比结果表明, 具有创业失败经历的个体行动者组在工作经验 (EXP)、教育程度 (EDU) 和实际收入 (INC) 方面与未经历创业失败的控制组存在显著差异, 这一结果也表明个体行动者的特质差异导致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可能会最终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误。本文使用 Logit 模型对匹配变量进行了筛选, 参与筛选的匹配变量为本文回归模型中出现的所有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 0 ~ 1 虚拟变量, 1 表示经历创业失败, 0 表示未经历创业失败, 同时控制了国家效应和年度效应。回归结果表明, 教育程度 (EDU) 和工作经验 (EXP) 两个变量对个体行动者是否经历创业失败存在显著影响, 因此, 在样本匹配中将这两个变量作为匹配变量。

基于 Logit 模型的拟合值计算出相应的倾向得分值, 并采用 PSM 模型最为常用的“最近邻匹配方法”对经历创业失败组和未经历创业失败组的 PS 值进行配对, 配对后结果同时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common support) 与平衡性假设 (balance test), 最终根据配对后样本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4、表 5 所示。结果表明: PSM 配对样本后上述假设依旧成立, 表明本文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3 创业失败经历、制度环境与创业选择关系检验

Table 3 Regression of prior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hoice of entrepreneurship

变量	EC				
	M1	M2	M3	M4	M5
<i>POP</i>	0.014 2*** (0.003 13)	0.013 5*** (0.003 13)	0.014 7*** (0.003 13)	0.018 2*** (0.003 15)	0.018 2*** (0.003 15)
<i>UNE</i>	-0.010 2*** (0.001 23)	-0.009 68*** (0.001 23)	-0.009 95*** (0.001 23)	-0.011 3*** (0.001 24)	-0.011 3*** (0.001 24)
<i>IN</i>	0.110*** (0.014 1)	0.110*** (0.014 1)	0.108*** (0.014 1)	0.050 8*** (0.015 6)	0.051 7*** (0.015 6)
<i>CT</i>	0.004 46** (0.002 17)	0.003 69* (0.002 17)	0.004 13* (0.002 17)	0.001 57 (0.002 19)	0.001 58 (0.002 19)
<i>CNI</i>	-0.293*** (0.013 9)	-0.286*** (0.013 9)	-0.293*** (0.014 0)	-0.293*** (0.014 0)	-0.293*** (0.014 0)
<i>AGE</i>	0.009 37*** (0.000 259)	0.009 37*** (0.000 259)	0.009 35*** (0.000 259)	0.009 22*** (0.000 260)	0.009 22*** (0.000 260)
<i>EXP</i>	-0.259*** (0.007 36)	-0.259*** (0.007 37)	-0.258*** (0.007 37)	-0.242*** (0.007 43)	-0.242*** (0.007 43)
<i>INC</i>	0.234*** (0.004 45)	0.233*** (0.004 45)	0.234*** (0.004 45)	0.219*** (0.004 49)	0.219*** (0.004 49)
<i>EDU</i>	-0.006 53** (0.003 24)	-0.006 95** (0.003 24)	-0.007 17** (0.003 24)	-0.008 16** (0.003 26)	-0.008 16** (0.003 26)
<i>EF</i>		0.199*** (0.017 1)	0.253*** (0.017 9)	0.230*** (0.030 8)	0.222*** (0.032 3)
<i>EF × IN</i>			0.200*** (0.023 0)	0.183*** (0.023 1)	0.154*** (0.040 0)
<i>GEN</i>				0.299*** (0.007 01)	0.299*** (0.007 01)
<i>GEN × EF</i>				-0.015 9 (0.036 5)	-0.004 46 (0.038 9)
<i>IN × GEN</i>				0.118*** (0.012 2)	0.117*** (0.012 3)
<i>EF × IN × GEN</i>					0.042 5 (0.048 9)
χ^2	8 394.40***	8 525.78***	8 602.26***	10 485.83***	10 486.58***
伪 R^2	0.048 5	0.049 2	0.049 7	0.060 6	0.060 6
观测数	306 020	306 020	306 020	305 953	305 953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表 4 PSM 配对后的创业失败经历、松 - 紧文化与创业选择关系检验

Table 4 Regression of prior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 tight-loose culture and the choice of entrepreneurship with PSM

变量	EC			
	M1	M2	M3	M4
POP	-0.013 6*** (0.003 8)	-0.013 6*** (0.003 8)	-0.013 3*** (0.003 8)	-0.013 3*** (0.003 8)
UNE	-0.012 0*** (0.001 4)	-0.012 1*** (0.001 4)	-0.012 2*** (0.001 4)	-0.012 2*** (0.001 4)
IN	-0.113 *** (0.015 4)	-0.113 *** (0.015 4)	-0.113 *** (0.015 4)	-0.113 *** (0.015 4)
CT	0.010 3*** (0.002 69)	0.010 2*** (0.002 72)	-0.006 23 (0.028 3)	-0.006 84 (0.028 7)
CNI	-0.071 9*** (0.015 7)	-0.072 0*** (0.015 7)	-0.071 1*** (0.015 7)	-0.071 1*** (0.015 7)
AGE	0.010 3*** (0.000 3)	0.010 3*** (0.000 3)	0.010 4*** (0.000 3)	0.010 4*** (0.000 3)
EXP	0.159*** (0.020 0)	0.159*** (0.020 0)	0.191*** (0.020 4)	0.191*** (0.020 4)
INC	0.210*** (0.005 6)	0.210*** (0.005 6)	0.210*** (0.005 6)	0.210*** (0.005 6)
EDU	-0.001 0 (0.004 1)	-0.001 0 (0.004 1)	-0.001 4 (0.004 1)	-0.001 4 (0.004 1)
EF	0.241*** (0.009 6)	0.241*** (0.009 6)	0.192* (0.110)	0.194* (0.110)
EF × CT		-0.019 1*** (0.005 4)	-0.022 3*** (0.005 4)	-0.010 6*** (0.005 5)
GEN			0.427*** (0.051 7)	0.427*** (0.051 7)
GEN × EF			-0.049 1 (0.110)	-0.047 8 (0.111)
GEN × CT			0.016 1 (0.028 4)	0.016 7 (0.028 7)
EF × CT × GEN				-0.084 4*** (0.006 3)
χ^2	3 588.93***	3 599.06***	3 668.46***	3 668.48***
伪 R ²	0.034 4	0.034 8	0.035 2	0.035 2
观测数	153 839	153 839	153 839	153 839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表 5 PSM 配对后的创业失败经历、制度环境与创业选择关系检验

Table 5 Regression of prior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hoice of entrepreneurship with PSM

变量	EC			
	M1	M2	M3	M4
POP	-0.013 6*** (0.003 8)	-0.013 0*** (0.003 8)	-0.012 8*** (0.003 8)	-0.012 8*** (0.003 8)
UNE	-0.012 0*** (0.001 4)	-0.011 9*** (0.001 4)	-0.011 9*** (0.001 4)	-0.011 9*** (0.001 4)
IN	-0.113 *** (0.015 4)	-0.059 0*** (0.016 1)	-0.217 *** (0.074 9)	-0.246 *** (0.087 5)
CT	0.010 3*** (0.002 6)	0.011 0*** (0.002 6)	0.010 6*** (0.002 6)	0.010 6*** (0.002 6)
CNI	-0.071 9*** (0.015 7)	-0.070 6*** (0.015 7)	-0.069 8*** (0.015 7)	-0.069 7*** (0.015 7)
AGE	0.010 3*** (0.000 3)	0.010 1*** (0.000 3)	0.010 2*** (0.000 3)	0.010 2*** (0.000 3)
EXP	0.159 0*** (0.020 0)	0.151 2*** (0.020 0)	0.181 0*** (0.020 4)	0.181 1*** (0.020 4)
INC	0.210 *** (0.005 6)	0.211 *** (0.005 6)	0.211 *** (0.005 6)	0.211 *** (0.005 6)
EDU	-0.001 0 (0.004 1)	-0.000 9 (0.004 1)	-0.001 1 (0.004 1)	-0.001 1 (0.004 1)
EF	0.241 *** (0.009 6)	0.255 *** (0.009 8)	0.259 ** (0.113 0)	0.236 ** (0.117 0)
EF × IN		0.206 *** (0.017 3)	0.206 *** (0.017 3)	0.104 (0.162)
GEN	(0.053 8)		0.446 ***	0.440 *** (0.053 2)
GEN × EF			0.159 ** (0.073 8)	0.152 ** (0.074 6)
IN × GEN			0.003 95 (0.113)	-0.019 0 (0.117)
EF × IN × GEN				-0.103 (0.163)
χ^2	3 588.93 ***	3 729.30 ***	3 812.91 ***	3 813.31 ***
伪 R^2	0.034 4	0.035 8	0.036 6	0.036 6
观测数	153 839	153 839	153 839	153 839

注: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4 结束语

4.1 结论

在转型经济国家中,虽然创业活跃度持续上升,但创业活动的高失败率是个不容质疑的事实。创业失败者会否卷土重来,是否比没有创业失败经历者更可能选择创业?是否创业失败经历本身促进了创业选择?哪些因素会影响创业失败者卷土重来?现有研究并未给出一致、可靠的理论逻辑和实证答案。

首先,本文以动态化的视角整合了组织学习理论与创业认知理论,构建的创业失败学习理论一致地阐明了创业失败经历如何促进了创业选择,并揭示了松-紧文化、制度环境和个体行动者性别的调节效应。

同时,基于2001年~2009年23个国家306 020个有效样本的数据的研究表明,具有创业失败经历者选择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高,而且这种更高的可能性在排除了具有创业失败经历者与从未创业者的特征差异后依旧存在,说明创业失败经历本身促进了创业选择。

继而,紧文化会通过提高个体行动者创业失败成本和创业失败归因,导致无法自我启动创业失败学习机制,从而削弱了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制度环境作用则恰恰相反,提供完备的市场保护机制和资源支持,有助于降低创业失败成本和突破再创业的资源约束,从而强化了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文化宽松度较高、制度更为完备国家的失败创业者更可能卷土重来。与此同时,松-紧文化对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不同性别的个体上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女性创业者而言,紧文化的约束作用在男性创业者身上更为明显。

综上,本研究为回应上述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逻辑和统计证据。

4.2 成果

首先,本文的核心成果是回应了现有研究在解释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决策之间关系的争议^[34-67],并以动态化的视角整合了组织学习理论与创业认知理论,构建了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选

择之间关系的一致的理论逻辑(创业失败学习理论)。虽然创业认知学派指出了创业失败经历对于形成个体行动者创业认知的重要影响^[12],但其过度聚焦于创业失败对创业者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强调创业失败的财务成本、情绪成本和自我效能感下降^[3,13-15]。而组织学习理论多将“试错”视为学习的难得契机,凸显了创业失败经历对提高创业者发现和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的正面影响^[1]。事实上,创业失败经历的这两方面影响是创业失败学习过程的或然结果,依赖于特定的情境条件。本文的结论表明,创业失败经历所激发的创业失败学习是个动态化的过程,能够改变个体行动者的元认知,进一步改变创业者心智模式与创业思维的改变,优化信息搜集和处理方式,培养个人的创业激情和克服过度自信,从而提高其在后续过程中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对创业风险的控制。通过这一整合性理论分析框架,不仅动态化地呈现了创业失败经历对未来创业决策之间的影响路径与机理,同时也扩展了组织学习理论与创业认知理论的应用边界。

其次,本文通过引入松-紧文化概念更好地揭示了文化情境对创业决策的影响,同时在创业失败学习情境下揭示了制度环境的创业价值。传统的创业认知理论虽然提出外部环境对个体行动者创业决策的影响,但主要还是聚焦于个体行动者自身的企业家能力(创业能力),这导致现有实证研究中较少考察外部文化与制度环境对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本文选择创业失败这一特殊创业情景,检验了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两类外部环境因素对个体创业选择的影响。创业活动作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个体所展开的经济活动,与外部环境存在密切联系。文化与制度作为两类重要的外部环境要素会通过形成社会价值观判断标准和经济行为的博弈规则来约束个体行为决策。上述研究不仅回应了Shepherd等^[5]关于创业研究应该注重外部环境因素检验的呼吁,同时跨国比较发现的差异结果也意味着解读不同国家创业失败率与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体或经济层面的因素,更应该将文化与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

第三,本文进一步明晰了文化影响创业决策的性别差异,在创业失败情境中发展了女性创业研究。性别刻板印象虽然提高了女性进入创业活

动的门槛,但这一劣势在创业活动中同样可以变为优势。随着转型经济国家女性参与创业活动的比例逐年提升,女性创业也逐渐成为创业领域研究的焦点。现有文献主要强调了社会角色理论下女性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面临的劣势,但并未有研究发现在创业失败这一独特情景中女性创业者的优势。主流价值观形成的刻板印象会降低社会对女性创业者创业成功的预期^[58],对女性创业者失败更为包容,这也导致在紧文化国家中女性创业失败的财务成本与情绪成本更低,从而具有更大的可能再次创业。本文的发现意味着女性创业面临的社会文化塑造的性别刻板印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其直接影响是种种资源或合法性约束^[57,68],但其深层次影响也包含了对其失败的包容;而男性虽然在创业过程中相对容易获取支持,但同时也包含了利益相关者对其更高的期望,其创业失败的财务和情绪成本更高;而紧文化情境下,这两类影响都会更强。

最后,本文通过匹配 GEM、世界银行和 Gelfand 等数据库挖掘了 GEM 等二手数据在创业失败研究的价值,有力地解决了样本自选择偏差、特定文化或制度情境样本外部效度不强等典型的统计检验缺陷。实际上,本文数据库的构建受到了 Gelfand 数据库的约束,仅能构建起 23 个国家的数据,但依旧获得了 306 020 个随机抽样的有效微观样本,从而确保了实证检验的可靠性。

4.3 实践启示

本文发现了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决策在不同文化、制度及性别情境下的差异效应,这意味着完善创业相关制度安排、营造(或选择)宽松(相对不紧)文化氛围、构建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等实践举措,有利于创业失败者卷土重来。

首先,完善创业相关制度安排。创业失败者卷土重来的决策受到制度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本文发现,完备的市场保护机制和资源支持,有助于降低创业失败成本和突破再创业的资源约束,从而强化了创业失败经历与创业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正如 Eberhat 等^[69]指出的那样,完善的破产法,尤其是降低破产不必要的财务和社会成本的法律制度,有利于创业失败者重整旗鼓,促进创新创业企业成长。类似地,完善市场准入的约束条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打破非市场化的垄断、减

轻双创企业融资的制度约束等,完善创业相关的制度安排,大有可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极其不均衡的大国,中国各区域的制度差异很大^[71],创业者应该主动选择适宜创业地区。

其次,营造宽松文化氛围。文化氛围影响了其创业失败带来的情绪成本、财务成本、自我效能感、资源获取和动员能力^[3,6,13-15],是再次创业决策的重要情境因素。一方面,虽然文化是长期的历史和社会过程的结果,但是掌握强大资源和话语权的中国政府对于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营造宽松的文化氛围,不仅有利于创业失败者卷土重来,也有利于技术创新等风险较高的战略活动。另一方面,影响创业者决策的文化氛围是其个体行动者嵌入的社会网络或组织,不同区域或社区的次文化差异可能非常大,创业失败者应主动选择适宜的创业社区。

第三,构建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本文发现,社会文化和创业者性别刻板印象对创业失败者的卷土重来形成了三重交互效应,虽然在紧文化情境下,女性创业失败者卷土重来可能性更高,但是,这是在女性创业率总体偏低背景下的次生效应。另一方面,紧文化背景下,男性创业失败者卷土重来可能性更低,这也意味着在性别刻板印象强的背景下,男性面临着过高的社会期望,承担了“不可承受”之重。要激发全社会的创业激情,让具有创业特质和才能的人尽情创业,推动中国社会创新创业更上台阶,这都有赖于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强加在潜在创业者身上的约束。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局限:第一,跨国大样本数据使得本文具有更好的统计稳健性和外部效度,但受限于二手数据本身的变量测量,在机制识别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后续研究如果能采用恰当的实验设计,将能更清晰地揭示创业失败学习发生的情境条件、学习过程和心理机制,这对于深化创业失败学习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第二,在 GEM 的测量中,准确识别了其个体行动者是否有创业失败经历和其调查时的创业决策,但不能区分没有创业失败经历者中从未创业者和成功创业者,只能采用统计手段(PSM 模型)排除具有创业失败经历者与从未创业者的特征差

异的影响。未来研究如果可以更长时间周期地跟踪个体行动者的创业历程,拥有其创业活动过程更加细致的测量或观察信息,将可以进一步坚实统计检验过程,并丰富创业失败经历如何影响创业决策的理论机理。

最后,创业失败者卷土重来自然而然地引出其创业绩效的问题。由于本文的主要目标是构建

统一的创业失败经历影响创业决策的理论逻辑(创业失败学习理论),以及受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没有分析其创业绩效问题。实际上,创业失败者再次创业的绩效及其情境条件,他们与首次创业者、创业成功者的连续创业等其它类型创业者创业绩效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于晓宇,蔡 莉. 失败学习行为、战略决策与创业企业创新绩效[J]. 管理科学学报,2013,16(12): 37-56.
Yu Xiaoyu, Cai Li. Learning from the failure, strategic decision comprehensivenes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3, 16(12): 37-56. (in Chinese)
- [2]Cardon M S, McGrath R G.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oward a psychology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and re-motivation [J].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1999, 29(4): 58-72.
- [3]Shepherd D A. Learning from business failure: Propositions of grief recovery for the self-employed[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2): 318-328.
- [4]Mitchell R K, Busenitz L, Lant T, et al. Toward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Rethinking the people side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2, 27(2): 93-104.
- [5]Shepherd D A, Williams T A, Patzelt H. Thinking about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making: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41(1): 11-46.
- [6]Cardon M S, Stevens C E, Potter D R. Misfortunes or mistakes? Cultural sense making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1): 79-92.
- [7]Gelfand M J, Raver J L, Nishii L, et al. Differences between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A 33-nation study[J]. Science, 2011, 332(6033): 1100-1104.
- [8]Singh S, Corner P, Pavlovich K. Coping with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2007, 13(4): 331-344.
- [9]Grégoire D A, Shepherd D A. Technology-market combination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opportunity-individual nexu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4): 753-785.
- [10]杨 俊. 创业决策研究进展探析与未来研究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4, 36(1): 2-11.
Yang Ju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research: Analysis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4, 36(1): 2-11. (in Chinese)
- [11]Alvarez S A, Busenitz L W.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esource-based theor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1, 27(6): 755-775.
- [12]Cope J. Toward a dynamic learning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29(4): 373-397.
- [13]McGrath R G. Falling forward: Real options reasoning and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1): 13-30.
- [14]Cope J.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6): 604-623.
- [15]于晓宇. 创业失败研究评介与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1, 33(9): 19-26.
Yu Xiaoyu. Evaluation and prospects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research[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1, 33(9): 19-26. (in Chinese)
- [16]Minniti M, Bygrave W. A dynamic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1, 25(3): 5-16.
- [17]Kolb D A.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84.

- [18] Busenitz L W.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96, 34(4): 35–45.
- [19] Byrne O, Shepherd D A.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Entrepreneurial narratives of emotion, cognition, and making sense of business failur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15, 39(2): 375–405.
- [20] Thapar A, Ratcliff R, McKoon G. A diffusion mode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aging on letter discrimination [J]. *Psychology and Aging*, 2003, 18(3): 415–429.
- [21] Haynie J M, Shepherd D A, Patzelt H. Cognitive adaptability and an entrepreneurial task: The role of metacognitive ability and feedback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12, 36(2): 237–265.
- [22] Diwas K C, Staats B, Gino F. Learning from my successes and from others' failures: Evidence from minimally invasive cardiac surgery [J]. *Management Science*, 2013, 59(11): 2435–2449.
- [23] Baron R A. The role of affect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 33(2): 328–340.
- [24] Hisrich R, Langan-Fox J, Grant S.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nd practice: A call to action for psycholog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7, 62(6): 575–589.
- [25] Tang J, Kacmar K M M, Busenitz L.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in the pursuit of new opportuniti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2, 27(1): 77–94.
- [26] 郝喜玲, 张玉利. 认知视角下创业失败研究述评和未来展望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 38(8): 3–14.
Hao Xiling, Zhang Yuli.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from a cognition perspectiv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6, 38(8): 3–14. (in Chinese)
- [27] Ardichvili A, Cardozo R, Ray S.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1): 105–123.
- [28] Eckhardt J T, Ciuchta M P. Selected variation: The population-level implications of multistage selection in entrepreneurship [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8, 2(3): 209–224.
- [29] Shane S A. A general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individual-opportunity nexus [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04, 22(2): 206–209.
- [30] Chen C C, Greene P G, Crick A. Doe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distinguish entrepreneurs from manager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8, 13(4): 295–316.
- [31] Shepherd D A, Krueger N F. An intentions-based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teams' social cogni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2, 27(2): 167–185.
- [32] Cotterill K.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trepreneurs' attitudes to failure in technology ventur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Science*, 2012, 4(2): 101–116.
- [33] Wilson F, Kickul J, Marlino D. Gender,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entrepreneurial career intentions: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 31(3): 387–406.
- [34] Mitchell R K, Mitchell J R, Smith J B. Inside opportunity formation: Enterprise failure, cogn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opportunities [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8, 2(3): 225–242.
- [35] House R J, Hanges P J, Javidan M, et al.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4.
- [36] Hofstede G.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1980, 10(4): 15–41.
- [37] Fang T. A critique of Hofstede's fifth national culture dimens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2003, 3(3): 347–368.
- [38] Shavitt S. Normative tightness-looseness: A research dialogue [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17, 27(3): 375–376.
- [39] Shin D, Hasse V, Schotter A.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within cultural space and place: Integrating cultural distance and tightness-loosenes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60(3): 904–921.
- [40] Waldman D A, De Luque M S, Washburn N, et al. Cultural and leadership predictor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values of top management: A GLOBE study of 15 countr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6): 823–837.
- [41] Muthukrishna M, Henrich J. Innovation in the collective brain [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6, 371(1690): 1–14.
- [42] Sutton R I, Callahan A L. The stigma of bankruptcy: Spoiled organizational image and its management [J]. *Academy of*

- Management Journal , 1987 , 30(3) : 405 - 436.
- [43] Gimeno J , Woo C Y. Multimarket contact , economies of scope , and firm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1999 , 42(3) : 239 - 259.
- [44] Malin E L , Ibrahim D Y , Tu J W , et al. Involvement of the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consolidation of inhibitory avoidance memory: Interaction with the basolateral amygdale [J].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 2007 , 87(2) : 295 - 302.
- [45] Triandis H C , Brislin R , Hui C H. Cross-cultural training across the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divid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 1988 , 12(3) : 269 - 289.
- [46] Gelfand M J. Culture's constraint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strength of social norms [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 2012 , 21(21) : 420 - 424.
- [47] Kambhampati U , McCann P. Regional perform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J]. Regional Studies , 2007 , 41(3) : 281 - 294.
- [48] Khanna T , Palepu K. Why focused strategies may be wrong for emerging markets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1997 , 75(4) : 41 - 48.
- [49] Aldrich H E. Using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o study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rate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 1990 , 14(3) : 7 - 24.
- [50] 蔡莉, 单标安. 中国情境下的创业研究: 回顾与展望 [J]. 管理世界 , 2013 , (12) : 160 - 169.
Cai Li , Shan Biaoa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J]. Management World , 2013 , (12) : 160 - 169. (in Chinese)
- [51] Baron R A.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entrepreneurship: Why and when entrepreneurs think differently than other people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 1998 , 13(4) : 275 - 294.
- [52] Jennings P D , Greenwood R , Lounsbury M D , et al. Institutions , entrepreneurs , and communities: A special issue on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 2013 , 28(1) : 1 - 9.
- [53] Westhead P , Ucbasaran D , Wright M , et al. Novice , serial and portfolio entrepreneur behaviour and contribution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 2005 , 25(2) : 109 - 132.
- [54] Schaltegger S , Wagner M.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and sustainability innovation: Categories and interactions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 2011 , 20(4) : 222 - 237.
- [55] Hyttinen A , Ilmakunnas P. What distinguishes a serial entrepreneur?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 2007 , 16(5) : 793 - 821.
- [56] Fischer E M , Reuber A R , Dyke L S. A theoretical overview and extension of research on sex , gender , and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 1993 , 8(2) : 151 - 168.
- [57] Gupta V K , Turban D B , Pareek A.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opportunity evaluation as a function of gender stereotypes and stereotype activa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 2013 , 37(4) : 771 - 788.
- [58] Black N. Social Feminism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9.
- [59] Calás M B , Smircich L. Using the F word: Feminist theories and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C] //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 Academy of Management , 1989 , (1) : 355 - 359.
- [60] 李新春, 叶文平, 朱沅. 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1) ——基于 GEM 数据的跨国(地区) 比较研究 [J]. 管理科学学报 , 2017 , 20(8) : 112 - 126.
Li Xinchun , Ye Wenping , Zhu Hang. Social capital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regional) data based on GEM data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 2017 , 20(8) : 112 - 126. (in Chinese)
- [61] Acs Z J , Arenius P , Hay M , et al. 2004 ,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4 Executive Report [R]. Babson College , London Business School , Babson Park , London , 2004.
- [62] Davidsson P. The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hallenge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2008.
- [63] 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J]. 经济研究 , 2014 , 49(12) : 126 - 142.
Wang Yongqin , Du Julan , Wang Kai. The determinants of location choice of China's ODI: Institutions , taxations and resources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4 , 49(12) : 126 - 142. (in Chinese)
- [64] Dawson J F , Richter A W. Probing three-way interactions in moderated multiple regression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slope difference test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 2006 , 91(4) : 917 - 926.

- [65] Aiken L S , West S G , Reno R R.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Inc. , 1991.
- [66] Lian Y , Su Z , Gu Y.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equity incentives using PSM: Evidence from China [J]. *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 , 2011 , 5(2) : 266 – 290.
- [67] Eggers J P , Lin S. Dealing with failure: Serial entrepreneurs and the costs of changing industries between ventur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2015 , 58(6) : 1785 – 1803.
- [68] Gupta V K , Guo C , Canever M , et 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 rapidly emerging major economies: The case of Brazil , China , India , and Korea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 2014 , 10(2) : 367 – 384.
- [69] Eberhart R , Eesley C E , Eisenhardt K M. Failure is an op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 entrepreneurial risk and new firm growth [J]. *Organization Science* , 2017 , 28(1) : 93 – 112.
- [70] Shi W , Sun S L , Yan D , et al. Institutional fragility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2017 , 48(4) : 452 – 476.

Which venture losers are more likely to start again?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from tight-loose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YANG Xue-ru¹ , YE Wen-ping^{2*} , YU Xiao-yu³ , LI Xin-chun⁴ , SU Xiao-hua²

1.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42 ,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 Jina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32 ,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 Shanghai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44 , China;
4. Sun Yat-sen Business School , Sun Yat-se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275 , China

Abstract: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is a high failure rate of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the world. Although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brings emotional and financial costs for entrepreneurs , such experiences also provide them with uniqu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us , a key factor to reduce social costs of entrepreneurship is to activate venture losers' passion of persisting in their entrepreneurial endeavor. Using 306 020 samples selected from three panel databases including GEM , the World Bank and the Gelfand ,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 prior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experience on the choice of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entrepreneurs without failure experiences , entrepreneurs with prior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experiences are more likely to start entrepreneurship again. Such relationship is further amplified in countries with a looser culture and superio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 three-way interaction among gender , culture and prior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is identified , which implies female entrepreneurs are more likely to restart entrepreneurship in countries with a looser culture. Our study embedded gender differences into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analysis , thereby extending prior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tight-loose cultur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